

张杰 赵毅衡 主编

当代符号学译丛

Library of Semiotics Today

《符号自我》

(*The Semiotic Self*)
(美) 诺伯特·威利 著 文一茗 译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美) 约翰·迪利 著 周劲松 译

《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

(*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加) 马塞尔·达内西 著 孟登迎 王行坤 译

《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

(*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加) 马塞尔·达内西 著 肖惠荣 译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英) 罗伯特·霍奇 冈瑟·克雷斯 著 周劲松 张碧 译

《音乐·媒介·符号》

(*Music, Meaning and Media*)
(芬兰) 佩基莱 (美) 诺伊迈耶
(美) 利特菲尔德 编 陆正兰等 译

《存在符号学》

(*Existential Semiotics*)
(芬兰) 埃罗·塔拉斯蒂 著 魏全凤 颜小芳 译

《传媒符号学》

(*Media Semiotics*)
(英) 乔纳森·比格内尔 著 白冰 黄立 译

相关信息可登陆www.semiotics.net.cn进一步了解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
邮箱 | semio.china@gmail.com
电话 | 028-8541-2710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关注形式，而社会学关心的是内容，两者距离遥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误会了。符号学研究人的意义活动，而人的社会生活湮没在意义中：蹈矩循规，礼尚往来，潮流时髦，尊严羞愧，自讨其辱，门当户对，守成进取，继往开来……哪个不是意义活动？可以说，社会学诸问题，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主任）

当代符号学译丛
Library of Semiotics Today

社会符号学

(英) 罗伯特·霍奇 冈瑟·克雷斯 著
周劲松 张碧 译

SOCIAL SEMIOTICS

[英] 罗伯特·霍奇
Robert Hodge 著
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周劲松 张碧 译



符号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之中，存在于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之中，而这些符号体系则是社会所构成的，并且必须被当做社会实践来处理。因此，社会符号学所研究的人类符号体系，既同人类的符号活动相关，又同社会意义相关。正是在符号活动与社会意义这一既庞杂繁芜又微妙难传的结合点上，作者通过对符号在模仿层面和活动层面的模态和叙事的深切把握，讨论了从民俗、宗教、诗歌、绘画，到电视访谈、杂志报道、流行时尚，乃至漫画和涂鸦等大量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展示了符号学的阐释力量。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定价 36.00元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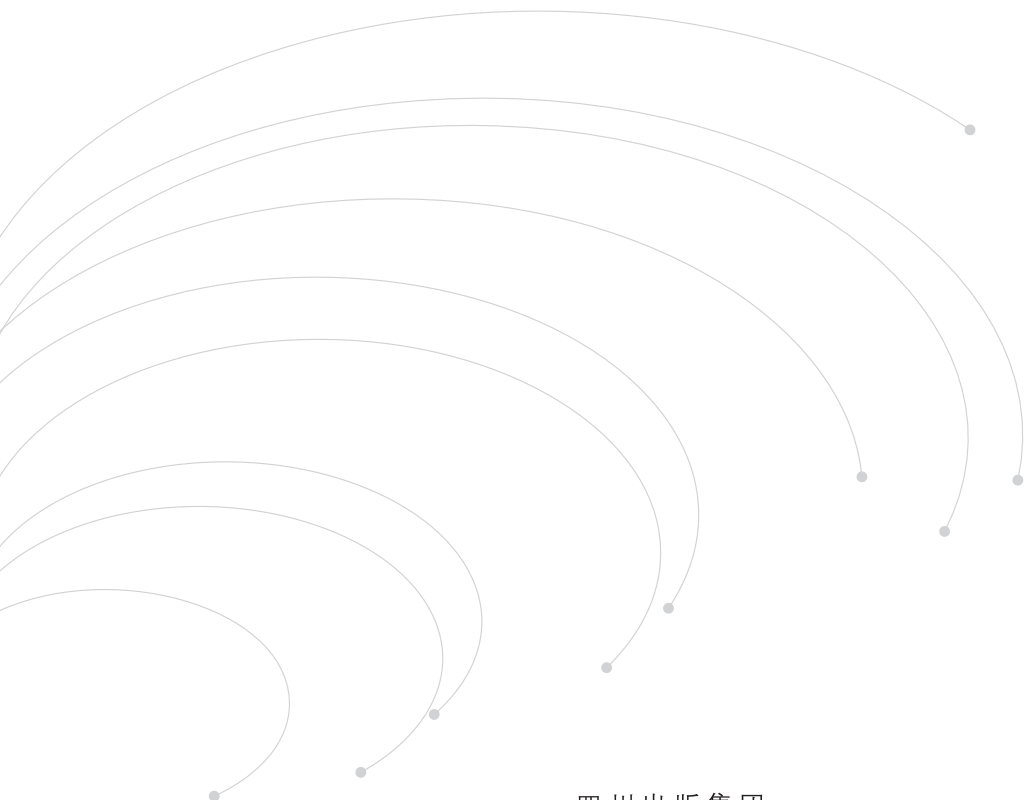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 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英〕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 冈瑟·克雷丝（Gunther Kress）著
周劲松（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 碧（西北大学文学院）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09-07 号

Copyright © Robert Hodge and Gunther Kress 198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符号学 / (英) 霍奇 (Hodge, R.), (英) 克雷斯 (Kress, G.) 著;
周劲松, 张碧译.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6
(当代符号学译丛 / 张杰, 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408-5973-2

I. ①社… II. ①霍… ②克… ③周… ④张… III. ①社会学-符号学
IV. ①C91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114 号

责任编辑 郑晓韵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吴映泉
责任印制 杨 军 陈 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68mm×240mm
印 张 18 插页 3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当代符号学译丛

总 序

赵毅衡 张 杰

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 20 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其原因倒是在学院之外：整个人类文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切在变，并给了它各种好好坏坏的称呼：“信息经济”、“超级现实”、“平坦地球”、“精神分裂时代”、“泛审美化”、“奇观时代”、“消费时代”、“消闲时代”、“娱乐至死时代”、“历史终结”、“流动现代”、“软件现代”，不一而足。每个称呼都很有道理，都有道理就说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习惯，是从现象纷纭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偏偏在这个紧要的转变关头，我们苦于不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焦虑无法把握现象流，更无法窥看一眼可能的未来。

这就是当前符号学繁荣的背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递、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我认为我 20 年前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依然有用：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既然研究意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化。

当前文化的一个总特点，就是符号活动出现了剧烈变化：数量上是符号淹没人类活动，品质上是符号杂出多元，价值上符号渐渐代替物质成为目的，社会上符号越来越成为权力杠杆。因此，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焦虑，或许只有强调符号学这个社会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才有可能解决。

这就是我们策划这套译丛的动机：让我们看看全世界一些最杰出的头脑，是如何从符号学角度考虑当代文化诸问题的。

为什么要看译著？不是说中国人无法独立对付这个课题，中国是世界符号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秦名学（墨子名辩论、道家意言说、儒家正名说、名家学说）已经深入研究符号学诸课题；佛教哲学（尤其是因明论与唯识宗）对符号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将让全世界符号学界倾听。目前全世界各大学有几十个符号学研究中心，有40多份刊物/网刊。中国在符号学研究上，落后于传统文化大国，也落后于瑞典、芬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印度等重视学术的欧亚国家。无论是为继承传统，还是为开发学术资源，中国没有理由落后。现在中国各大学纷纷开出符号学课程，本译丛或许能给老师和同学们打开一些思路。

然而，符号学面对的课题，是世界性的。这不是说符号学有“普世性”，而是说符号学研究本身就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是高度比较的。格雷马斯曾经不无忧虑地建议，共通的表意模式，恐怕只能在比较“同质”的文化之间考虑。如果他看到今日全球青少年在打同一种电子游戏，玩类似的恋爱游戏，他做符号模式研究时，可能会放心得多。正是因为看到一个趋势，本译丛的编者译者同仁，才坚信这项工程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符号学—传媒学的理论涵盖面，超出了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围。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音乐学、信息论、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商品经济研究、市场研究、城市规划、设计研究、计算机研究、游戏机设计、生态学、旅游研究、动漫研究等等门类，均有学者在应用符号学。他们的贡献，必然会丰富符号学理论。所以本译丛有意挑选多样主题、多方向内容。

身处正在巨变的文化中，往往当局者迷。符号学能帮助我们跳出细节，跳到庐山外，看到云遮雾盖后面的底蕴。莫泊桑经常到埃菲尔铁塔里喝咖啡，他与19世纪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极端讨厌这个竖在眼前的铁家伙，但是在整个巴黎，只有到埃菲尔铁塔里才看不到埃菲尔铁塔。巴尔特分析说这个塔绝对无用，是个不需要理由的空的存在，然后才变成巴黎的意义所在。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愿意在远眺埃菲尔铁塔的地方，手握一本符号学坐下来，瞅着这个人类愚蠢的产物，看它在眼前变幻成文明之



美的象征。然后在咖啡热腾腾的雾气中，嫣然一笑：原来变化并不神秘，是我们的解读让世界变成意义无穷，符号化就是我们的生存秘诀，更是淹没人类未来的洪峰。

（附注：本译丛受四川大学 985 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平台的支持。）



序 言

本书是一项进行了十余年的课题的阶段性的成果。1979年，我们出版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Language as Ideology*）一书，这是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实用的语言学”或“批评的语言学”六年探索的结晶。这种语言理论，目的是为包括历史、文学和媒体研究、教育、社会学在内属于一系列不同学科的批评理论家——在其文本和话语形式的工作中，他们想要对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操作进行探索——针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口头语言，提供一种富有启发的描述。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目标读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然而，这一理论范畴中却存在着许多内在局限。为了达成一种实用的、批评的语言理论这一初衷，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其中一些缺憾，我们之后会在本书中来解决。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前提，它们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课题的基础。首先，在理解语言结构和操作时，社会维度是重中之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我们认识到也考虑到社会维度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同意，语言的文本和结构是分析的正式起点。现在，我们将社会结构和操作、信息及意义作为正确出发点，以此展开对意义系统的分析。其次，就我们的核心立意来说，先前这著作局限于口头语言，现在看来，有着极大的不便。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其他意义系统中，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中，仅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这，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有了第二个前提，即在孤立情况下，任何单一符码都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研究和充分理解的。所以，口头语言理

论必须放在由所有符号体系组成的理论这一语境中，这些符号体系都是社会构成的，并且都须当做社会实践来处理。于是，我们对先前的课题进行拓展，并将现在这部著作命名为《社会符号学》。

实际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正出自我们对符号学总体思考的语焉不详，因为当时那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对这些问题充分地理论化。那时，我们以为，集中关注符号过程的某个部分——口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将更为广博的框架视为当然，似乎是行得通的。在许多探索领域中，这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摇摆不定，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就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一种互补性举措，二者共同组成了我们课题的基本面貌。没有与口头语言以及与各种语言学理论传统的深度关涉，我们的符号学探索势必陷入纠缠不清的一片茫然。没有与一般符号学问题的参照，我们的分析模式，哪怕是口头语言分析模式，对那些研习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学生而言，会大大降低实用价值。在跳出语言理论那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这一条件下，我们会继续强调语言理论的潜在价值，强调须把语言学和口头语言研究完全放置到关于社会操作的总理论中去，因为意义正是通过社会操作才得以构建，才具有效力。

我们希望，本书对研究不同领域问题的人都具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学科背景不同，但他们都需要精确追踪各种文本中的意义交流，而无论这些文本是口头的还是视觉的，或是嵌刻在特定对象、举措、实践或行为之中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它的价值体现在对一系列学科的各种分析实践活动都有所贡献上，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只装满特技的宝箱，不论意图和目的如何，任何人都可以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工作，是基于交流与社会理论中众多假设之上的。本质上，我们把交流视为一种操作，而不是将其看做由意义或文本所组成的系列被拆解之物。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物质形式和施为者方能达成的。它关系到具体的主体和客体，而且除非是从这套关系入手，它根本就不可得到阐释。典型地，社会是由权力结构和关系组成的，为其驱使或受其抵制；其性质正是冲突和协同所赋予的，所以，各个层面上的意义结构，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到局部的意义行为，都会以不同比例，以种种方式，显现出矛盾、含混、多义的迹象。所以，对我们而言，文本和语境，施为者和对象，社会结构和诸种力量，包括其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了符号学分析最为基本和不可化约的对象。无疑，这种分析对象是复杂而苛刻的。



然而，孤立地考虑符码、文本和意义，这种想法看上去是简单多了，实际上，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不仅难度没有降低，而且最终远远无法完成任务。

本书思考酝酿颇费时日，在此之中的各个阶段，许多人为之奉献了自己的观点、评论及资料。诸多对我们有过影响的人，都在参考文献部分提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韩礼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著作，如《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等，还因为他是语言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者、教师、探索者，是激励我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者曾就我们之前那本书发表过评论，即使我们无法全然认同，这些意见还是让我们深受启发并有所裨益。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皮埃尔·阿沙尔、约翰·弗洛、理查德·赫尔格森和约翰·汤普森。而且，汤普森阅读了本书较早的一稿，对其进行了敏锐而不失宽容的评论，使我们获益匪浅。一些同事提供了很有用的意见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悉尼技术大学的史蒂芬·米克、柯尔丁技术大学的诺埃尔·金以及莫道克大学的艾伦·曼斯菲尔德、霍斯特·鲁斯洛夫和米歇尔·奥图尔。阿尼·戈德曼、史蒂夫·辛克莱、安妮·克兰妮-弗朗西斯、雷切尔·克雷斯、乔纳森·克雷斯以及卡西·米特森等为本书提供了材料、评价和讨论。我们对上述以及允许我们引用其著作和论述的诸位表示感谢。

帕姆·霍奇和吉尔·布鲁斯特对本书的贡献卓著，却只能在此聊表谢意。本书大部分章节都请他们进行了试读，与他们之间的讨论，使得他们对本书的许多观点，贡献几与我们同等。

最后，感谢辛西娅·贝克，她那双充满魔力的手让失去的东西完好如初，混乱而难以辨认的纸片被她整理为一份漂亮的打印稿。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社会符号学

- | | |
|-----|----------------|
| 002 | 意识形态综合体与思想控制体系 |
| 005 | 信息、文本与话语 |
| 007 | 体裁、顺从和反抗 |
| 008 | 社会符号学和文本分析 |

001

第二章 回顾奠基之父

- | | |
|-----|-------------|
| 015 | 索绪尔的垃圾箱 |
| 019 | 社会与符号 |
| 022 | 符号如何工作 |
| 024 | 符号学和现实 |
| 029 | 结构主义和符号的物质性 |
| 032 | 历史、变化、转换 |

第三章 作为意义的语境：符号活动维度

- 042 | 关于权力与稳定性的信息
- 049 | 权力和稳定性的媒体建构
- 055 | 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和身体
- 062 | 画作放置背景的意义
- 064 | 坐姿的意识形态
- 066 | 意识形态与性别建构
- 071 | 场域与反世界
- 076 | 仪式的空间和时间

第四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格

002

- 082 | 作为元符号的风格、腔调和语法
- 086 | 腔调、差异、社群
- 094 | 阶级、文化和定式
- 100 | 性别的元符号
- 110 | 作为症候的风格

第五章 真实的社会定义

- 123 | 探索一种关于模态的总体理论
- 130 | 视觉媒介的模态
- 145 | 处于危急之中的模态
- 149 | 模态和控制
- 154 | 差异与社群建构



第六章 转换与时间

- 164 | 符号学与历史
- 166 | 探索关于转换的唯物主义理论
- 170 | 时间中的符号活动
- 175 | 共时性横组合段与凝结了的时间
- 177 | 作为转换的蒙太奇
- 184 | 解读历史
- 194 | 解码经典

第七章 爱与权力的转换：叙事的社会意义

- 206 | 关于家庭文本的符号学
- 211 | 《俄狄浦斯王》的社会意义
- 221 | 家庭照片与家庭文本
- 229 | 幸福家庭和叙事顺序：从历史中抽取时间

003

第八章 进入符号活动：为文化而培训主体

- 241 | “瞧，那是操作指南”：开始步入性别和权力
- 246 | 牙齿还是粉刺：归化还是抵抗
- 250 | 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 254 | 符码与主体：就写作而论

- 260 | 附录：社会符号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 267 | 参考书目

第一章 社会符号学

对许多人而言，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术语是比较新鲜的，在使用方面也有许多概念上的困难。符号学被定义为“关于社会中符号生活的科学”（索绪尔 1974）。如此定义之下，使得其范畴既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丰富。从符号学角度讲，文化中的一切都可被看做一种交际形式，它们以类似口头语言的方式进行组织，并按照通常的一套基本规则或原则得到理解。在今天的学术机构中，对该现象的研究往往是在诸多学科中进行，不成体系而且零散，略举最为突出的，就有心理学（其中派系林立）、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及电影研究等等。符号学承诺把交际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以有体系的、全面和条理清晰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某些现象。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符号学试图将自己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言——不知是好是坏，它实际并没做到这一点——符号学伊始之际，便充满不安和矛盾。符号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以令人对它的宣示郑重对待。然而，符号学也承受着一系列批评，这已经汇聚成一种力量，对其构想和实践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批评的核心前提是主张符号体系的社会维度是其性质和功能所固有的，所以不能将体系割裂开来加以研究。“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符码，但牺牲了符号体系的功能和社会应用，以及社会实践中各种符号体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些因素，正是符号学的动力所在，正是其出发点和目标、形式和实质。主流符号学重视的

是体系和生产，而不是具体社会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彼此关联互动的符号活动中的说话人、作家或其他参与者。它赋予权力以意义，而不是赋予意义以权力。它抹去了符号学领域的界限，却默认了将符号过程与社会、将符号学与社会和政治思想隔离开来的那堵厚墙。

由于上述反对意见，许多提出了值得我们尊重观点的同事，对符号学本身是拒绝的。他们认为这些缺点是根本性的，是与该研究领域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们认为符号学不可救药，纯属陷阱和虚妄。对此，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我们认为，重建符号学的尝试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种尝试承认对之所做的批评是有力的，但又超越了它们。它吸纳符号学现有形式所具有的力量，并且甘愿冒我们将无法全然避免某些局限的危险。重建工作必须进行，因为，不论这些批评在其自身方面如何适宜，它们都缺乏让人信服的分析实践。符号学，或者说某种符号学，必须为分析实践提供可能性，因为不同专业学科的许多人，都在对付关于社会意义的不同问题，都需要多种途径来描述和阐释意义的构成过程和结构。大部分符号学都没有抱着这种运用视角，而这正是本书要承担的任务。

意识形态综合体与思想控制体系

社会符号学必须依赖一些有关社会与意义的一般性假设。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来源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

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0: 42)^①

这一论断强调了具体的个体, 他们相互作用, 并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他们是意识的基础和源泉, *Bewusstsein* 这个德语单词在此被翻译为“意识”, 其所指涉的却是符号操作的一整套东西, 包括施为者、对象以及源于物质和社会世界、且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的种种力量。各种交际形式(德文中之 *verkehr*, 意即交流, 交换体系), 都与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相呼应, 这是其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与大部分其他社会形态一样,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着权力和其他产品分配不均的状况。因此,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 存在着社会结构上的裂隙: 这样的社会显示出特色的统治结构。为了维系这种统治结构, 统治集团试图用反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力利益这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世界。但同时, 他们也需要维系作为其统治条件的稳固联系。被统治阶级并非总是处处无法看到对这些统治结构的运作。于是, 渐次地, 他们会竭力抗拒统治, 常常也能够在社会结构中不可胜数的社会交锋中获取成功。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中进行反抗或采取对立的那部分人之间, 必然存在双重性和矛盾性, 从此之中, 暧昧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运而生。意识形态被视作虚假意识, 是以“上下颠倒”、本末倒置的方式表现世界。但意识形态也如其所应该的那样展示了世界的形象, 或者如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 或者如同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为了把握意识形态这一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矛盾, 我们要谈到意识形态综合体(ideological complexes), 这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由对世界种种矛盾看法所组成的集合, 它由某个社会集团出于自己特别的利益而针对另一集团强行施加, 或者由另一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试图进行抵制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识形态综合体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维系权力与稳定的关系, 它以同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服务来表现社会关系。利益的实际对立, 催生了综合体中必然存在矛盾。综合体的构成要素, 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关系模式(对各社会施为者、行动、对象等等的归类)和行动模式(对社会施为者而言, 什么行为、动作是需要的、允许的或禁止的等方面的规定)。这表明了这样一

^① 此处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2页。——译者注。

种意思：我们要使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两个术语，来表示对于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特别功能、定位和内容的社会意义层面。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同我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意思不同，他们的理由也同样充足。用法多样可能造成混淆不便，但却无法轻松得到解决，而且，这个术语过于重要，社会符号学的确无法抛弃不用。

构建意识形态综合体，目的是为了采取特定的方式，通过建构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各种现实样式，对行动做出限制。由于意识形态综合体把矛盾性的符号形式作为解决态度和行为矛盾的工具，因而它们是不可能独立起效的。矛盾中对立的双方都想把对方消灭掉。因此，我们要调用信息的次一级层面，该层面不仅对意识形态综合体的运作进行调节，而且还与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直接相关。

对信息的每个生产者而言，要想信息按照其所预计的那样起效，就得依靠它的接受者。这就要求信息接受者在另一层面上了解信息，了解那些为如何阅读该信息提供了特别知识的信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笑话”，笑话是一种陈述，本身可能被证实为对接受者有所冒犯。笑话信息的制造者却要依赖这一事实，即听笑话的人知道，这样的陈述，也许附带有其他“笑话”标记，是“不会被当真的”。听笑话的人也许不知道那层信息——就像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常见的那样，或者选择拒绝那层信息——譬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就会不把冒犯性陈述当做“笑话”。运用反语，是另一种使用次级信息调节信息功能的浅显易懂的情况。我们将这种更高级的控制机制称为“思想控制体系（logonomic system）”，该术语源于希腊文逻各斯（logos），意为思想或思想体系，也指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或话语，nomos即控制或指挥机制。思想控制体系是一系列规则，规定着意义生产和接受的条件；它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带着什么情感态度（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以什么理由），针对什么主题，谁能宣布启动（生产、交流）或知道（接受、理解）意义。思想控制体系在生产 and 接受关键点上对社会符号行为做出了规定，因为如此，我们得以区分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s，即对生产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和接受体制（reception regimes，即对接受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

思想控制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信息，是意识形态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使之意义明确。在统治结构未受到挑战之时，思想控制体系通过保证符号行为的活动来最终确保统治结构的统治地

位。一旦统治结构面临危机，思想控制体系极可能成为竞技场。思想控制体系会得到具体社会行动者（父母、教师、雇主）的专门传授和保护，并通过原则上可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操作，对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个体进行压制。思想控制体系受到诸如儿童、学生、雇员等社会行动者的挑战。思想控制体系必须清晰明确，否则就无法运作。在礼仪习俗、礼节、产业关系、立法过程等等领域中，思想控制体系尤为昭彰。

思想控制规则表现在关于人、话题、生活环境等一系列划分上，这些是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还是源于统治群体的统治观念。思想控制体系必然对来自交流过程的系列信息进行编码，因而标识出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状态。譬如当某种思想控制体系允许把对妇女有所冒犯的一段话解读为“笑话”，这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性别关系结构，其中相对女性而言，男性不但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群体，而且需要掩饰他们对女性的敌意与侵犯。

因此，思想控制体系暗示了一种社会理论、一种认识论以及一种社会情感态度理论。和意识形态综合体一样，思想控制体系反映了社会组成中的矛盾和冲突。典型地，它们具有一个总体结构，这个总体结构是（表达统治者的统治权的）一般性规则与（有条件地承认被统治者反对的）其他或例外相加所构成的。这样，在功能和内容方面，意识形态综合体和思想控制体系就被彼此联系起来，思想控制体系通过控制一个个的行为（符号活动）来表达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意识形态综合体则作为一个整体，投射出系列矛盾，使得统治前提不仅取得了合法性，而且为其强化赢得了诉求空间。

005

信息、文本与话语

对符号的结构和操作进行分析时，社会符号学大量援引了来自主流符号学中的术语和概念。但符号学尚不具备共同认可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有，社会符号学也得对其中一些进行重新定义，方能表现自身对社会行动、语境和运用的强调。下面，我们将对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用的关键术语进行描述。

拥有具体存在的最小符号形式是“信息（message）”。信息具有直接性——有其渊源和对象，有其社会语境和目的。信息指向符号活动操作，

意义正是通过这一社会性操作得以构建和交流，它所发生之处，我们称之为“符号活动层面（semiotic plane）”。信息是关于被认为存在于自身之外的某事物的。信息与信息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世界彼此关联，信息的意义就来自信息所实施的这种再现或模仿功能。我们把再现所发生的层面称为“模仿层面（mimetic plane）”。

但符号活动领域并不简单地是由信息累积构成的。在符号行为中，连串的信息在符号活动参与者间穿梭往返。在言语交际研究中，针对这一更大符号单位，常常使用“文本（text）”和“话语（discourse）”这两个词。我们在扩大的符号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用以表示信息结构或信息轨迹，它们都具有社会赋予的统一性。文本一词来自拉丁文 *textus*，意为“编织在一起的东西”。话语一词常常用于与文本同类之物，但我们对两者有所区分，坚持用话语来表示文本嵌刻于其间的社会操作，而用文本来表示产生于话语之中的具体物质性客体。文本与话语的指向不同。文本的主要指向是模仿层面，在这里，它因为投射出某种样式的现实而具有意义。话语则更直接地指向符号活动层面。

006

文本还同另一个重要概念——体系（system）——彼此相对。主流符号学发展出符号体系的概念，将其作为在文本中得以实现和具体化的抽象结构。对于如此体系，主流符号学倾向于将其处理成一种静止之物，以为它是一种社会事实，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无关。相对而言，我们强调，每一符号体系都是符号活动操作的产物，都记录着该符号体系自身的建构史。体系中的术语根据其在该体系中所处位置而具有自己的价值。同时，体系在文本中不断得到再生产和重构。若非如此，体系将不复存在。所以，文本既是符号体系的物质现实，也是不断有着变化发生的场所。

文本与体系间的辩证关系总是发生在特定符号行为之中，亦即话语之中。在这一意义上，话语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社会组织形式与符号体系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彼此关涉，从而对构成了文化的系列意义和价值进行再生产和改变。所以，譬如医学机构制定出一套专门的意义，它总是要涉及该机构相适的社会操作，关系到病人、医生、研究人员等重要参与人群。在他们所生产的这些相互行为和文本中，这套意义不断得到应用，并在应用中面临断裂的危险。对社会符号学而言，文本和话语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同一现象层面之上的互补性观点。但是，尽管我们强调话语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却并不表示，文本和信息就是非社会性的用语。在其生产

与再生产之际，文本和信息二者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关系。

体裁、顺从和反抗

为了探析微观、宏观结构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些居间的范畴。种种思想控制体系拥有约束文本和话语一般形式的规则。这些体系常常通过对文本的体裁（genre，联系生产者、消费者、主题、媒介、方式和地点的文本典型形式）做出规定来进行操作。这些东西不仅控制着文本生产者的行为，也控制着潜在消费者的期望。体裁规则是思想控制体系的范例，也是思想控制体系得以运作和传达的主要途径。和文本范畴一样，体裁是对符号形式具有的社会属性的界分。

只有在一个社会群体宣示并实施那些使之合法化的规则时，体裁才会存在。譬如有明确规定来调控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行为，即所谓委员会会议。也就是说，由一个社会群体来建立、承认和命名特定一类场合，并且，对针对以什么做法来约束这些场合中参与者的行为，也有清晰规定。委员会会议操作中形成的文本，因此而拥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参与者的实践和相互关系、参与者的期望和目的进行编码。这样的文本形式——无论是作为“完全记录”还是“会议摘要”——本身都被认为是体裁，是具有效力的符号范畴。其他例子也很容易想到：譬如访谈、讲座、专题报道、聊天、小说之类。每一种这样的体裁，都对社会参与者之中存在的“特定”关系进行了编码。这里所讨论的规则体系，在某些事例中（譬如采访）要比其他事例中（譬如小说）更显而易见，但可见程度不高并不就等于运用得不充分。所谓“小说的兴起”乃是一部历史，追溯了一系列历史特定关系，涉及阶级地位、性别定义（和话语）、技术状况、休闲与教育、基于阶级的家庭的概念，诸如此类。从其“兴起”开始的小说这一体裁的历史，也包括了这些关系的嬗变，以及其作为新话语的重要因素、作为现存话语中那些嬗变的表现。体裁由此代表了一个符号学范畴，这个范畴对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斗争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编码。

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规定性体系（思想控制体系、体裁、意识形态等），会产生一种内置性歪曲，并会强化观念的主导作用。就其得到有效施行而尚未遭到有效抵制而言，这些体系仅仅是限制了非统治群体的行为

和信仰。留心符号操作细节，便会发现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例的实质，在这些事例中，权力中发生的那些次级嬗变都产生了重大效果，促使统治结构发生改变，有时是被统治集团取得成功，有时是统治集团取得成功。这种操作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结构及其建构的著作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斗争与反抗的操作，本身就是社会组成的决定性方面，影响了符号体系的各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权力被放到每一次交际中去检验，而思想控制体系，典型地，通过把大块符号活动领域划为“私有”而成为检验的记录，且此“私有”须被当做超出“公共”/社会范围之外的东西来处理。与之相仿，通过将矛盾形象纳入其强制性结构，意识形态综合体试图在对抗中先发制人；即便如此，矛盾还是在那里存在着，无声地宣示出统治阶级的权力局限。所以，统治者和非统治者之间的意义和利益是按照非预先决定的比例共同作用的，这构成了每个层面上意义的诸多形式和诸种可能。我们并不认为抵抗总是成功而有效，但是，我们也不会像许多研究社会意义的理论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想当然地以为抵抗总是被毫不费力地收编，被弄得毫不重要。

008

社会符号学和文本分析

通过对一幅万宝路香烟的展板广告进行分析，我们将阐明对社会符号学的基本描述，在那上面，名为“使用展板涂鸦反对不良促销”的群体（简称BUGAUP）添加了一些修改（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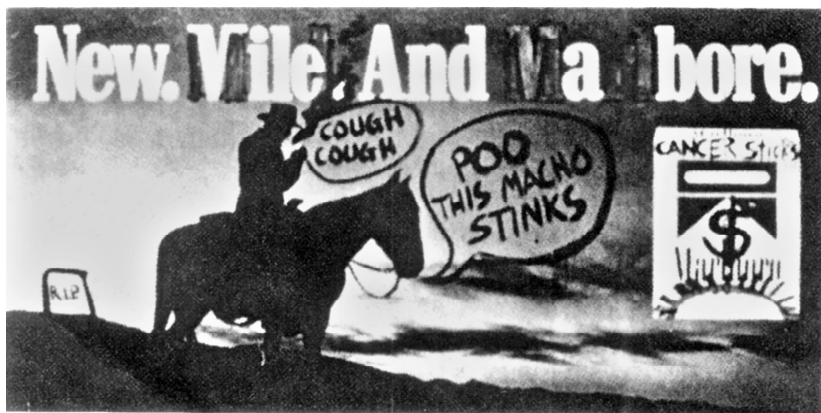


图 1.1 已被修改的万宝路广告。

我们的阐述从对思想控制体系的描述开始，这里的思想控制体系，即控制这个文本的正常生产和接受的一套社会信息。从符号层面和从围绕文本生产的那些条件开始，我们想说明的是，社会符号学描述不能从幼稚的文本——语境入手，恰恰相反，它必须将语境理论化，并将其理解为其他的一系列文本。

原初的广告是一个大规模文本，被显示在一张展板上，展板本身挂在一个公共空间的砖墙上。这直接标识着一套思想控制规则：树立如此尺寸展板的权利，明显掌握在地方政府法律以及控制着譬如这幅广告之类信息在“公共”空间里出现的代理商手里。该广告在此出现，就已经表明，这个文本得到了极为不同的各种制度的合法授予。这里，我们取得了这个体裁的一个社会决定要素：当地议会依照法律或按照自由裁量权，既能够决定文本是否可以出现在这里，又能够决定哪种文本可以出现。进一步控制广告在此出现的，是向广告人出租空间的代理商。从观看/观察广告的人的观点来看，这对接受是有重要影响的，哪怕这些东西没有被经过此处的读者注意到。该文本具有制度化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只要想象一下如果在那里出现其他文本，我们就会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影响：譬如一则鼓励吸食海洛因或者鼓吹释放一个被警方判处监禁的囚徒的信息。这样一种文本在此处出现将会是“让人震惊的”。

文本本身是有大小和类别的，这暗示了对重要物质资源的使用。这种资源的可取得性，被读者理解为生产这一文本的前提条件，它赋予文本以特定地位，并将读者置于特定位置。在本例中，该文本是作为“对抗”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系列文本之一，所以读者/观众可能会在电影、电视、杂志中，看到类别与之极为相似的其他文本。

这些东西表明了思想控制体系的某些方面，它们已进入该文本生产、外观和接受之中。它们为该文本投射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读者/观众被以特定方式安置其中：他们虽然是参与者，却无法参与任何意义制造的公共活动。这种参与的可能性被明确地排除：法律保障展板不受“侵扰”。他们只能“私人性地”观看、阅读、回应。由于该文本所具有的普泛性结构，他们被当做（潜在的）消费者而成为言说对象。如果读者允许自己被建构成消费者，那么，这就赋予了他们一种权力。所以，作为读者，他们毫无权力；而作为消费者，他们却拥有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以该文本制造者赐予的礼物这种样式体现出来的。对读者/消费者进行

安置/建构这个问题，让我们对模仿内容的意识形态结构有所思考。原初的广告图片上，是一个牛仔的剪影和一大盒香烟。上面的文字是“新颖。醇和。万宝路。”(New. Mild. And Marlboro.)。这句话中的句号是很重要的。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单词或者省略句：它们是“陈述句”。作为读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的是每一个陈述都包含着大量的意义域。所以，就算我们希望开展大量的符号工作，但我们已被当做读者，已然完全成为身在这些陈述意义内部那个群体的成员。此种条件下，在积极阅读/投身其间过程中观众/读者的位置，与其意义已经完全熟悉的文本之间，会产生出某种张力，该文本是通过这种张力才得以运作。这是意识形态综合体中固有位置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效果。如果我们从事这种阅读，我们将被迫尝试着重新追寻已经在前面那个广告文本中建构出来的路径，其中“新颖”是现代人类的基本品质，不仅要求他们自己须做到，也要求其他人以及所有对象都须做到。但是，“新颖”同时也处于透过牛仔这一浪漫化形象所流露的怀旧和敏感这种张力之中——尽管牛仔是非常“老旧”的，但他却既是“新颖”的都市人，又能够在都市人的户外活动中如鱼得水。“醇和”与图上那刚毅的男子气概的形象及其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个词在这里出现，还指向对其他话语的压制/否定：那些与健康相关的话语（反吸烟运动），以及那些与性别相关的话语，这个词可能被建构成针对女性主义者对男子汉气概这种传统观念所做批评的一种回应，因此醇和/温柔可能用来表示那种“新颖”的男性的阳刚。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阅读立场和阅读本身都是性别化了的。该文本的制作者可能有刻意的意图，要在这里吸引“女性”观众，这样的观众，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醇和”而不是“硬朗”所标识的价值观念接近的。在该语境中，我们也可联想到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女性消费者会构成了香烟消费市场中上升最快的部分的原因。

对这一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有些反对，是通过缺场而存在的：女性是缺场的，但她们不仅被“包括”在“醇和”的效果之中，而且还被“包括”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中：至少某些女性读者/观众会“认同”这个新颖、老派、醇和、硬朗的男性假想伙伴。这个牛仔是一个工人，在这里，他没有老板，他自己就是老板；不受束缚的个体，只身“抗争”或率性而为，这些观念，与该文本大部分观众/读者的生活结构，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立和矛盾。

于是这些便成为构成该文本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的一些特征。直接相关和具有偶然性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许多都表现为（系列性）文本形式——如何在该文本的形成中产生自己的影响便很清楚了：对反吸烟运动文本所做的半遮半掩的回应，女性主义对传统男人气概样式的解构；以“新颖。”和“万宝路。”样子表现出来的、由其他同一产品促销者所带来的其他的相似文本所具有的那种压力。当然，尤其重要的是该商品制造者的需求，他们要维护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提升他们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在所有方面，文本的结构都总是一种表征，表明了由社会要素构成的综合体正处于运行之中。

不过，如图所示，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入侵了这个文本，这种方式小心地利用了该文本中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某些矛盾，这就是由 BUGAUP 所进行的阅读/重写。这种阅读/重写既反抗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意义，也反抗思想控制体系的意义。后者把读者定位为交际活动中的被动角色，懦弱且易于妥协，而 BUGAUP 的阅读则以激进的方式对该体系进行了抨击。个体可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一本杂志中的广告进行丑化；作为一种私人行为，这绝不会掀起什么轩然大波。通过对展板的“丑化”，BUGAUP 的读者/作者把自己植入到了一个被禁止的符号角色之中，成了在公共地方以公开方式呈现颠覆性意义的交际者。他们不仅公然挑战公司的权力，而且暗地里挑战以地方权威、以掌控“公共”文本著作权和内容等作为代表的政府权力。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却又不得不面临另一种矛盾，即虽然政府坚持在每一个香烟盒上发布健康警示，控制或禁止在某些媒体发布烟草广告，但同时，政府又依赖着来自烟草税的国库收入。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BUGAUP 的作者利用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某些矛盾。“醇和。”所蕴含那些围绕阳刚/女人味以及健康的复杂意义，被改成“邪恶”而一笔勾销了。骑手和马所暗含的统一性（完整人性的一个方面）被削弱了：让马说出的那些话，暗示了女性主义者对这种男性建构的批判，同时，使得女性同这类男人产生认同的可能性灰飞烟灭了。这就是说，这种改写使用了被压制的话语的诸多方面，至少是将由女性声音发出的回声写了进去。

正如原初广告的效果之依赖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信息的联合效果，这种挑战也是从这两个层面汲取力量的。通过同时揭露和颠覆思想控制规则的方式，它说服了那些通常消极地受到这些规则约束的人们，而这种压

力的释放，又促使他们对这样的广告进行反对。相反地，那些赞成政府有权控制意义的人，则可能拒绝这些信息，认为它们“幼稚”、“品位太差”，即使他们并不赞成吸烟。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被理解成不断流动的符号活动的话语层面。作为文本，原初广告从与其他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中获取意义，这些与之具有互文性的文本包括那些具有更完备叙述的电视广告，以及由万宝路（或其广告代理商）和其他公司所创作的大量其他文本。BUGAUP 所做的评论，也许在无数读者的私人话语流中已经发生过。在这些读者那里，展板的意义有可能在连续不断的话语行动链之中得到了讨论、认同或反驳。这种情况下，文本的意义在话语操作中可能受到极大的改变，对文本的分析，针对文本的总的有效性而言，也有可能被误导。BUGAUP 加上的那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具有对话特色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对原初文本的一种读法被发掘出来，并被纳入该文本自身之中。然而，即使有了这种互动之后，话语流仍将继续下去，在与其他话语施为者及其利益的关系中，对新文本进行定位。文本这个概念必须得到保留，并同作为操作的话语概念彼此对照，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文本是一个过于有限、片面的分析对象。文本只是话语的迹象，僵硬而封闭，有时可靠，有时给人误导，没有定准。围绕文本流的话语却又消失得过于迅速。所以，分析工作应当兼顾文本与话语两个方面。

就使反对性阅读清晰可辨而言，上述这个特定文本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文本将针对它的这些反对性阅读呈现出来，并不是为了回避对立，压制从反面进行阅读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在阐明任一阅读的各种操作过程中，该文本表明了什么是完全典型的却又是典型不可见的。社会符号学不能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包括 BUGAUP 或类似团体所做评论在内的文本上。它所确实需要的，是承认在围绕文本建构意义时话语流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且找到把这种操作本身转变成各种文本的方法。意义总是在符号操作中得到沟通的，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作者通过绝对的符码从上而下无情地强加的。传统符号学喜欢认为，相关意义在文本自身之中都是僵化而固定的，通过客观、中立、为符码使用者所通用的编码体系，分析者就能将其提取出来并进行解码。社会符号学认为，文本实际上无法生产出它们作者所期望的意义和影响：斗争及其不确定的结果（这些必须在社会行动层面上进行研究），以及它们在意义生产中的影响。

第二章 回顾奠基之父

在本书中，我们会提供一种专门认识，论述符号学能够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对符号学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他类型的符号学中得到定位，并且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还广泛地借鉴了他人著作。我们所主张的社会符号学并非一种自成体系的事业。它是从以特定立场对先前著作进行精细的批评性阅读发展起来的，它对这些先前著作的某些部分进行了扬弃，对其余部分进行了吸纳、重组和改造，使其成为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所想要做到的，就其本身而言它须是符合逻辑而且有力的，就其做出判断的，不论新奇与否或者源出何方，须取决于它对那些从事着类似我们所做探索的那些人是否有效、实用。所以，在本章中，我们会大致勾勒出我们的立场，并且针对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的某些著作和现代符号学中某些奠基性概念，从这种视角切入，展开批评式阅读。

如同所有社会活动一样，符号学也拥有影响着自己现状和未来的过去，这一过去，也同样是在历史中建构出的，它使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交叠显得既不可避免又难以挑战。符号学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某种特定历史样式已经给出了专门而且有限的认识基础，而我们，则想要与此展开竞争，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称这种认识基础为主导性传统，但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它是铁板一块，或者在它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过去而回顾从前时，它就如此连绵无尽、没有断裂。我们想做的，既不是要与过去决裂（即使是假设这是可能的条件下），

也不是要对它进行重新组合，挪用它所拥有的权力。相反，我们会竭力恢复它此前被封闭的某些可能，并对过去处理得不成熟、不理性的某些分歧和矛盾做出强调。至此，我们一直在谈“传统符号学”，仿佛“社会符号学”与之是势不两立的，其实，这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事实上，传统符号学的所谓“传统”，不仅并非独石一块，甚至连作为一种理论与概念组成的、得到一致认可的东西它都算不上，它也根本不可能决绝地把社会一维抛在一边。对于这样一个如此难以定型且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并不打算对其做出清晰的综述，因为做到最好，这种东西都会显得太肤浅、太冗长乏味。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会批评性地检视某些关键人物的著作，这些人物在符号学这一事业形成的关键阶段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思想理念。

在进行如此的检视中，我们首先不能忽视的，就是索绪尔，在符号学的所有方面，他都被称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之父。人们有时把他和皮尔斯相提并论，但他的思想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作为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其门生后来也都在欧洲的著名学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索绪尔的地位对于其影响的广为传播非常有利，即使在他逝世后也同样如此。他的思想遗产形成了现代结构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另一方面，皮尔斯，他的思想是从美国19世纪末学术思想体系的边缘发展起来的，并且他的一些弟子本身就非常杰出，以至于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不必效忠于他的观念。符号学界的某些描述暗示，从两位奠基之父繁衍出了两种传统：源于索绪尔的、重视理性和结构的大陆符号学；源于皮尔斯的、更具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美国符号学。虽然美国符号学派确实拥有自己的特色形式，但对皮尔斯表面尊重与否却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散见于他的文集，相比某些自称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那些机械性理论，他的符号学观点实际上要更为微妙和流畅。并不存在着什么皮尔斯式的反传统，美国土壤上也没有结出什么累累硕果，使之能够与索绪尔的欧洲符号学相抗衡。但是，皮尔斯的确做出了自己的工作，虽然不成体系，但他对符号活动和思想的观察，却处处充满犀利而闪亮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有待人们付出努力，将其恰当地整合到普通符号学理论中去。

就其根本上是一个学院派人士而言，皮尔斯是一名哲学家。在知识被建制化的阶段，哲学有着广阔视野，致力于关于语言和思维一般性问题的研究。皮尔斯实际上已经用到了符号学这一术语；其他哲学家对于语言

和意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反思，却没有用过这个术语。某些思想家，譬如现象学传统中的胡塞尔，以及维特根斯坦，发展出了众多符号学性质的观点，但它们今天大部分都还止步于符号学传统之外。这些观点当然不乏影响力和支持者，但这种影响却被贴上了“哲学”的标签。于是乎，语言学就在既没有符号学，又没有语言哲学的情形下踽踽独行，而语言哲学则与更广阔的符号现象彼此隔绝，降格为对哲学语言的无休止分析，以之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对象。

“奠基之父”这个条目空间如此有限，但另外两位思想家却必须包容在内。一个是弗洛伊德。尽管像皮尔斯一样，他的思想也产生于边缘地带，但时至今日，他的影响之巨大已经无可置疑。由于拉康的拥戴，弗洛伊德作为始创符号学家（a proto-semiotician）的身份已得到认可。当然，拉康本人对弗洛伊德和符号学的看法并非确定无疑和无所不包，弗洛伊德思想在普通符号学中的地位也并没有盖棺论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设想的符号学重建，是沃洛辛诺夫的著作和巴赫金学派。沃洛辛诺夫的代表作（1973）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他对同时代的索绪尔进行了批评，但在西方，这部著作仅仅最近才开始产生影响，才开始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潜在决定性意义的、能动摇索绪尔学说的理论性著作。沃洛辛诺夫极大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滋养，而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理论界是受排斥的。不过，沃洛辛诺夫及其学术团体的其他成员，也同样被斯大林主义打入冷宫数十年。对沃洛辛诺夫的重新发现，还起到了塑造当代索绪尔的作用，它赋予了那些由索绪尔发起的话题以新的生命，为一种新的符号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和方向。

015

索绪尔的垃圾箱

一眼看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文本，它过于仓促地催生了符号学。在书中，索绪尔明确提到“符号学”的篇幅只有三页。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只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利用了符号学现象。其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他的特殊语言能力研究领域，即印欧语系中的语音流变史。这种矛盾在索绪尔留给我们的问题式遗产当中处于核心位置。一方面，他所倡导的学科具有最为宽广的范畴，可是另一

方面，他又制定出一系列限制，把他的理论遗产一分为二，这不仅使语言学发生扭曲，而且阻碍了符号学的到来，长达数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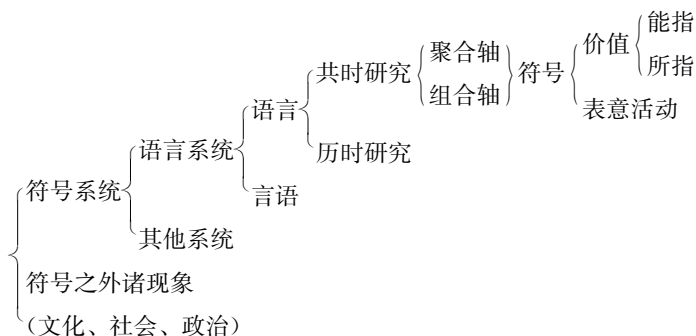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从索绪尔著作的多个方面来看待这个矛盾。他在讲求精确和学术性的比较语文学传统中接受训练，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主要目的，是对印欧语系进行历史重构，但这一传统实际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巴利和泽歇哈耶，索绪尔《教程》的编纂者，对索绪尔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常常听到索绪尔发出哀叹，遗憾自己学术发展期中用来对语言学进行标志的原则和方法过于匮乏。终其一生，他始终在固执地寻找能够在混沌中为他的思想指示方向的那些法则。”（1974：xxix）在《教程》中，索绪尔投身于构建一个崭新的、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的任务，所以，他构思了一幅简单、明晰而全面的图示，按照这种图示，这种封闭且狭窄的工作——他认为这种工作很符合自己的气质——就能在他所如此渴望的确定性伴随下，再度继续下去。他的基本策略是规划出一个庞大且没有差别的场域，然后，通过一连串显明的二分法对该场域进行划分；接着除去每组二分法中的另外一半；结果，索绪尔得到了一系列的分界线，每条分界线都被视为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绝对的、不断的窄化。这里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分界线所做的排除工作。符号学甚至今天依然需要索绪尔所用到的术语，而与这些术语打交道，就必须对这些分界线所标识的初始场域进行重新审视。索绪尔的分界划得十分彻底，而且，他本人对界线的需要，在许多学者那里也得到了共鸣，这些学者在语言学界和许多其他文化研究领域中都已经建构出了许多难以撼动的界限。

索绪尔那些著名的成对范畴常常被孤立讨论，但是，它们应该被理解成一个严格方案的组成部分和该方案进程中的诸个连续性阶段。在我们对索绪尔思想的总结中，我们将对这个方案的进程加以概括。在寻求纯粹的研究对象过程中，索绪尔首先做出区分，哪些是属于语言内在的东西，哪些是属于语言外在的东西，不过后者对语言现象这一研究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现象包括了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史、制度史、地理学等等。在对第一重区分进行厘定之后，索绪尔提出将外部语言学（external linguistics）剔除出去——即使他在别的场合还是坚持认为，语言是不可化约的“社会事实”。他把经过剔除之后剩下的部分归到一起，提出要将其作为更大的对象加以研究。这里所谓更大的对象，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体系。索绪尔把这种研究命名为“符号学”，并提前预言了它的存在，尽

管他本人实际上没有对之进行研究。

如此的口头语言，被索绪尔表述为一个如此的符号体系。然后，他把这个对象分成两个类别：“语言”（langue，由潜藏于话语之下的原则所构成的抽象体系）和“言语”（parole，人类话语：字面意义上的“语词”）。他认为，从本质上看，言语是一片毫无秩序可言的沼泽，是个体言说者对“语言”诸要素所进行的具有无限性和任意性的组合。他把言语作为不能被体系化研究的对象加以抛弃。然后把语言划分为两个部分：共时的（synchronic），即对语言——某特定语言群在任一特定时期所存在的体系——各个阶段所进行的研究；历时的（diachronic），即对跨时间的体系中那些变化所进行的研究。索绪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历时研究上，但他却把这些划为不可体系化的东西。对他来说，历时性变化基本上是零散的、非理性的。然后，索绪尔在两个轴上对共时性语言现象进行了描述：组合轴和选择轴，后者他称之为联想轴（后来，耶尔姆斯列夫在1953年将其分别重新命名为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共时语言学处理符号，符号在横组合或纵聚合的体系或结构中具有其价值和位置，也就是说，具有表意活动；共时语言学同时也处理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指涉对象关系。基于与框架中其他部分也相互一致的那些理由，索绪尔选择了对价值（位于体系中的那些关系）和表意活动展开思考，而不是对指涉对象展开思考。符号本身具有双重形式，这是由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共同组成的。索绪尔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和思考，但他的主要兴趣放在了能指上。能指也具有双重形式，它的双重形式是由物质实体（譬如钢笔画出一笔、一个物理性的声音）和作为精神事件的实体形象。出于个性化的考虑，索绪尔把对物质符号的研究降格为语言学之外的一种学科。于是，整个框架看上去是这样的：

017



这个方案中居于下方的，代表了索绪尔垃圾箱中的内容，对这些，他要么排斥要么简化。不过，被他排斥在外的部分是如此重要，以致人们不得不把这个人总是在犯错当做是一个很有用的现象。按照这种推理，那么，只要是索绪尔拒绝的，就一定是重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当然是太简单了。因为他所做的排斥行为和压制行为，总会使被压制东西的回归。那种被压制的东西乃是他体系里活力洋溢的原则。这种被压制之物，始终是能量、运动、操作，而无论什么发生了变化，或者什么引起了这些变化，或者怎么来描述这些变化。所以，索绪尔关于社会性高于个体性这一断言所表示的，只是抽象而僵化的那种社会秩序受到了不可胜数的个体活动的潜在威胁罢了。然而，在语言层面上，他主要研究词汇或短语，而不是更大的话语结构。也许，这可以被看做索绪尔更关心的是单个的语词，而不是语词存在于其中的那些结构。但是，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他的这种关心却泄露出，他一心停留在那些能够被确定因而也能够被了解的东西上，即使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只见到一片混乱喧嚣，旋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疆域之外的生活与话语中：在言语中、在社会中、在历史中以及在由物体与事件构成的难以驾驭的物质世界中。索绪尔竭力尝试逃避这个由种种操作所构成的世界，他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正表明他是充满爱怜地承认这些力量的，即便在他的理论之中，它们仅仅是作为被否定之物而出现。

以索绪尔为反向导（antiguide），我们可以将他所禁止的东西颠倒过来，将其改写成一种替代性符号学的基本前提（这样一种替代，在他的著作中是确已有之却未予明示）。这种替代性符号学至少包含了对以下诸个部分的研究：

1. 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
2. 伴随口头语言的其他符号体系；
3. 言语、言说行为、以其他符码形式进行的具体表意实践；
4. 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化；
5. 表意操作，表意体系与指涉结构之间的相互交流；
6. 所指结构；
7. 符号的物质性。

社会与符号

在沃洛辛诺夫 1929 年的著作中，他把索绪尔那些理论从头颠了过来，正如我们上面所做的那样。他的批评具有典范的流畅度，至今仍值得密切关注。他把索绪尔式传统贴上“抽象客观主义（abstract objectivism）”的标签，并剖析了其核心错误，即“伪核心”（proton pseudos）：“抽象客观主义，通过以语言体系作为对象并将其当做语言现象的整个要核，把话语行为——言谈——作为个体性的某物加以摒弃…… [但是] 言谈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论断指出，把将语言和言语分隔开来的做法，以及关于言语太个体化而无法成为理论对象，所以必须摒弃的观点，都是索绪尔思想中的致命错误。针对索绪尔致命的二分法，沃洛辛诺夫还对符号学现象的统一性进行了重新构建，他提出了三项主张，坚持物质性和社会性维度对于符号学分析是具有根本性的：

1. 意识形态与符号的物质现实不可分；
2. 符号与社会交际的具体形式不可分（必须看到，符号是有组织的社会交际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此而无法在其之外存在）；
3. 交际行为和交际形式与物质基础不可分。（1973：21）

沃洛辛诺夫本人关于符号社会决定论的观点，在关于个体和集体结构关系方面，并非没有问题：“符号形式首先要受到相关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制约，同时，还要受到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制约。”（1973：2）在这里，“同时”一语的使用将一般性社会组织与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这样一来，在解释符号行为中作用于参与者那些限制条件和决定因素中，社会符号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被轻描淡写了。沃洛辛诺夫所做的，是把话语行为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将其当做个体之间的交流，而这些个体的意识则是已经在社会中得到建构的。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这一层面对符号学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种种话语作用与阶级社会中种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彼此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层面上的思想控制体系的复杂结构，他却没有在阐述中进行展开探索。此外，

普通符号理论必须尽力对整个系列的符号行为进行理论化，包括写作、艺术、电影和大众媒体等，参与者在这些符号行为中的关系，要比在面对面的谈话交流中复杂和抽象得多。但这仅仅是说，沃洛辛诺夫把重要的任务留给了社会符号学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觉得，他关于“参与者构成的社会组织”与“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这两个阐述，可以称得上是再管用不过了。

沃洛辛诺夫建立了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性的东西都具有符号价值。”（1973：9）这里，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对此，我们稍后会做分析。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对他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语言，都不是将其不可抗拒的统一性强加于一个无助社会这种一成不变的现象。相反，在他看来，社会的特点是斗争、冲突以及不断进行着重新协调的关系所赋予的，而且，符号活动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这个过程。这里，他所提出的“腔调（accent）”这一概念非常有用。腔调是一种特殊的语音变化，为一系列明显共通的符号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譬如不同话语腔调会标识出阶级和地域身份的差异。除此之外，对沃洛辛诺夫来说，通过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相互关联，腔调还影响到符号的力量和意义。他把语言体系看做是典型地“复调性质的（multiaccentual）”，表面上看来共通的符码，由于不同阶级或团体所处的位置而发生折射、偏离。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可能把意识形态看做独一无二的一套意义或文本，以一种绝对的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方式自上而下强加而来。对索绪尔而言，语言必须是一种总体上说来具有集合性质的现象，否则，它就会是非社会性的、不可理解的。对沃洛辛诺夫而言，种种差异之间斗争、谈判、创造和解决的过程，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正处于符号学探索的核心地位。

我们相信，作为一种概览，沃洛辛诺夫的基础描述对于社会符号学而言是基本恰当的。剩下的任务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建设，并且面对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但是，指出有可能在这个方向起到引领作用的西欧传统中的几个方面，仍然是值得的。譬如皮尔斯对语言和符号曾有一种对话式的认识。“每一种思维都是一个符号，”他宣称（5.470），“所有的思维在形式上都是对话性质的。某一时刻的你会诉诸你的深层自我，以获取其允许。”（6.338）与沃洛辛诺夫不同，他把构成思维的交流内在化了，将其作为个人

心理事实表现出来，没有明显地扎根社会操作之中，因此，这是皮尔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缺陷。但是，反过来说，这与俄国心理学家维戈斯基后来（1962）发展起来的关于思维操作的描述，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维戈斯基本人所受到的影响，正是来自于沃洛辛诺夫和巴赫金学派。

皮尔斯也很重视对符号研究中的操作。对他来说，符号学乃是“关于符号活动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变异的学说”（5.488）。符号活动在这里就是一种操作，符号的行动，并非一个语言的结构或一个代码。“我用符号活动来指一个行动、一种影响，是说涉及诸如符号、该符号的对象和该符号的阐释符号这样的三个主体之间的彼此协作。这种三元关系的影响，无法以任何方式化解为发生在两两成双之物彼此间的行动。”（5.484）准确地说，皮尔斯到底用“阐释符号（interpretant）”表示什么，是并不清楚的，他的理论也多有争议。但是，符号过程涉及交换这种关联着对象、符号和阐释符号的操作，则是十分清楚的。阐释符号是和符号相互关联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一个陈述的阐释符号是其表述。”（5.473）阐释符号的生成，表面看上去，其操作是无限的，是一种无止境的符号活动，非常像自由联想这种操作方式。但皮尔斯坚持认为，这种自由和无限是有两个限制的。符号与阐释符号之间的关系，仍然受与对象、与物质性存在之间关系的控制。阐释符号无止境的流动，还受到他所谓“习惯”的控制（4.536），即关于思考和推理文化方面的专门规则，这些规则与我们前面称之为思想控制体系那些东西是相互呼应的。所以，与索绪尔不同，皮尔斯把意义看做一种内在性的操作，而非符号或文本的某种质素，而且他看准了一个地方，既能适合意义的物质决定因素，又能适合个体思考的总的社会文化限制。

即使是索绪尔，也不应被视为义无反顾地反对符号学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正是在这一论题上，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分歧，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著作。譬如，他列出了决定语言学范畴的三个目标：

1. 描绘并追溯所有可观察语言的历史……
2. 决定所有语言中普遍性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推导所有专门历史现象可以归结其上的一般规律；
3. 解脱自身束缚，为自身做出定义。（1974：11）

目标 1 和目标 2 突出了对影响语言的历史和社会力量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而目标 3 试图把语言学从符号学那里割裂开来，从社会和历史阐释中割裂开来。这一系列目标并非要对该学科这种更为宽阔的范畴表示敌意，而是对该项事业感到深刻的两难。索绪尔其实并没有将他所谓的外部语言学抛弃一旁，他指出：“我相信，对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的成果是极其丰富的；但如果说不研究外部现象的研究就无法理解语言学的内部机制，则是错误的。”（p. 22）这个表述明确承认了外部语言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也为内部语言学做出了吁请。后来的符号学家们以抽象、自主的内部语言学的名义，纯粹抛弃外部语言学，援引索绪尔来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这对索绪尔并不全然公平，因为他在这个论题上也是摇摆不定的。

符号如何工作

022

索绪尔弄混了符号活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使他的某些最具影响力的论断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这个问题中看上去并不居于讨论核心的那些方面。例子之一是他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arbitrary）这一学说：他用任意性表示（至少在口头语言中），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和“自然的”关系（譬如：“马”这个词，拉丁文 *equus* 也好，希腊文 *hippos* 也好，指的都是同一种动物）。所以，在“马的属性”这个概念同拉丁文、希腊文单词（以及其他语言中的许多其他单词）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自然联系。显然，就其所说的而言，这种观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索绪尔对这一论题的处理，附着了令人惊讶的重要性。他宣称，这就是“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其他无有过之。

事实证明，这是颇具影响而且有害的言过其实的陈述。实际上，正如某些有影响的符号学家所说，即使是对语词的声音，这也不可能绝对而且始终都正确。对口头语言中所有符号而言肯定也不都正确：索绪尔本人就承认，譬如句法模式，常常是他所谓“有理据的（motivated）”，即以某种理性的、“自然的”方式同其意义彼此关联。譬如英语中句子的主语首先出现，正是关于其重要性的有理据的能指标志。在口头语言之外，非常多的重要符号类型非常明显地具有特定的合理性（正如索绪尔本人所承认

的),因而要把任意性这一学说认定为符号学中一种普适性学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皮尔斯有一种更有帮助作用的符号分类。他把符号分为三大类:“象似符”(icon,建立在相似性或相像的基础上,譬如路标)、“指示符”(index,建立在相近或因果的基础上,譬如作为火的符号的烟),以及“规约符”(symbol,仅仅是约定俗成的联系,类似于索绪尔所谓任意性符号中存在的那些联系)。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表述,那么,三大类中的头两大类是有理据的。综观整个符号类型,似乎不可否认地,符号中存在着一个从更富有任意性到更缺乏任意性或更多地有理据到更少地有理据这样一个连续性。坚持认为符号统统地或同等地是任意性的,不过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对普通符号学而言是没有道理也没有任何裨益的。甚至索绪尔的术语“任意性”和“理据”也不乏误导性意味。有鉴于此,我们换用“透明(transparent)”这个术语来表示能指,表示它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可以被使用者轻而易举地看到,而无论这个使用者是符号发出者还是接受者。同时,指向问题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样一个符号,可能对其发出者而言是透明的,对其接受者却不是透明的,反之亦然。我们将与此相反的品质称为“不透明(opaque)”,这也是同特定行动者相互关联的。

但是,这种替代性提法并未阐明,为什么索绪尔会觉得坚持把任意性放在首位是必要的。与之形成悖论的是,索绪尔如此认定的动机,正在于他觉得,社会在决定口头符号体系中具有压倒性的权力。这一立场的逻辑可以分析如下:当索绪尔将其习惯的二分法思维方式运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时,他看到了两种可能。一是基于其物理属性,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联关系,或二者之间不具有这种关联关系。索绪尔的兴趣,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语音和词汇的研究上。审视过去和现在的语言,他发现,语词的变化多样,是与作为同一个概念的语言本身彼此呼应的,而这些跨越时间的变化又如此地具有延续性,因此,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抗拒这些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什么自然纽带。所以,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学说,是用一种戴上面具和借助否定的方式,表达了符号的社会决定论原则,这同沃洛辛诺夫所采用的形式,有同样的力度。

但是,索绪尔对该原则所采取的形式却没有沃洛辛诺夫的那么有帮助,而且,在实践中,它毫不惊讶地阻碍了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这是因

为，对于社会对语言的决定，索绪尔不仅将其看做是无限的，而且认为从其内部而言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他使用“任意性”这一术语的原因，仿佛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纽带关系必须臣服于社会这个威力难测的集体存在的那些心血来潮。将这些符号称为“约定俗成”，正如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并不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仍然是把决定的源头归结为社会，对研究这种决定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并没有鼓励的作用。沃洛辛诺夫的工作为探索表意活动操作的性质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他的方法是把这种操作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背景之中。在这一背景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活动的确十分有力，但却并非不可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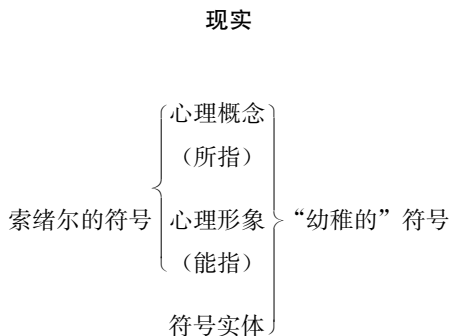
我们将再次使用 BUGAUP 的万宝路广告来对符号任意性实际分析所具有的关联性进行阐述。一方面，从“醇和”到“邪恶”的改变，看似很小，却产生出一个鲜明的对比性意义，这暗示出这两个词的语音所具有的任意性，想必索绪尔就会这么认为。“咳嗽”一词是任意性更弱、透明性更高的符号——它部分地是对咳嗽这个行为的重复——尽管两者不完全相同，而且得到了习俗的支持（“hack”，“cuck”，“cack”以及其他带/k/的发音，都同样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但是，这种文字书写风格自身也是一种符号，它能清晰地表现它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挑战者那种粗陋的涂写，同原初广告那种匀称的、机器制作的文字书写，两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原作的样子乃是一个指示符，乃是关于香烟工业控制大量技术资源的一个能指，而涂写，则表示对霸权结构的弃绝。这一意义编码在书写风格之中，正是总体效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符号是高度理据化了的，或者说是极其透明的。然而，它也是特定社会形式所特有的，因为确切地说，它正是从关于发达技术社会的结构和物质实践的某些假说中获得了自己的意义。这个符号既透明又为社会所特有这一事实，有助于它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与其他更为不透明的符号体系一道，创造出相关文本的总体意义。

符号学和现实

同样重要的是，实用性的符号学应对符号活动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所阐释，“现实”即提供符号活动对象和符号活动的物质世界。如果符

号活动不去面对这种关系，它就无法同实际事物产生关联，无法对“现实”做出自信的假设，也就无法解释符号体系在那个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困扰西方思想界数千年的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包括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问题，思维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界定“真理”和“现实”的问题。当然，在实践活动中，当人们称对方为骗子时，所依据的只是粗糙的、现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即使在现实的层面，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在期待关于真理和现实的绝对性定义的同时，摆出试图不要任何标准的姿态，也会带来实际的后果；情形很难会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一来，关于真理最为粗糙也最为现成的定义就会占据辩论场，彼此迎面相撞。

索绪尔对此做出的贡献，如同在许多其他方式中那样，是有欠明晰的。一方面，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种关系有问题的性质，但他另一方面又设计了一种策略，使得忽视这种性质的做法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他对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没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服力不足，因为他对此谈得太少了。在《教程》开头，他采取的是将语言视为“一个命名过程而已”这种颇为流行的观念（p. 65）。他将这种观念标记为“一种相当天真的方法”，而且按照他所总结的样子，情形的确如此。但是他所做的，不是提供一种不那么天真的描述，而是走上了他分离并断开这条惯常的老路。首先他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分离，在符号自身内部，在物质实体和该实体的心理形象之间，接下去是进一步的分离，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在概念和现实之间。结果的样子是四个层次，而不是天真的两个层次：



索绪尔没有看出这些层面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每个层面都是可以完全独立进行研究的。但是，他还宣称，在实践中，心理概念与心理形

象之间的联合如此地结成整体，以致无法区分。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思维是正面，声音就是背面；要切开正面，就不得不同时切开背面。”（p. 113）但是他没有看到，在符号（按照他对它们所进行的描述）与现实之间，有着与之相似的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相反，他觉得自己能够宣布，这种关系与语言学无关，这样语言学就能把注意力通通放在符号上，所以他作了如下定义：“语言学因而是在声音要素与思想两相结合的边缘地带展开工作的；二者的结合所产生的形式，而不是物质。”（p. 113）因此，他所做的，是要在两种物质层面上确立符号，并由此而确立符号学，其一是符号所指称的世界，其二是构成符号本身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来自同一物质世界）。“天真的”符号更为高级，因为它避开了这种强加于物质现实之上的双重分离。

回溯至柏拉图乃至更早，西方哲学一直关注着这组问题带来的困扰。在 20 世纪，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提供了一种走出指称问题困境的方法，这为关于指称的符号学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写于 1921 年的《逻辑哲学论》（出版时间仅比索绪尔的《教程》晚四年）中，他提出了以下前提：

4. 01. 命题是现实的图示。

命题是像我们所设想的现实的模样。

4. 011. 初看上去，命题——譬如像印在纸上的那样开始——似乎不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的图示。但是，书面的乐谱初看上去似乎也不是一首歌曲的图示，我们的发音符号（字母）似乎也不是我们话语的图示。

可是这些符码语言还是被证明是图示，即便是通常意义上，是它们所代表之物的图示……

4. 021. 命题是现实的图示：因为只要我理解这个命题，我就能够知道它所代表的情形。并且无须把它的意义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能够理解命题。^①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做的，是把表意活动的最小单位从一个单一元素变成了多个元素的组合（在符号学中，这常常被称为“横组合”）。皮

^① 此处译文参考了〔奥〕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39 页、第 40 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尔斯也将符号看做一个命题，将命题看做一个符号。索绪尔曾一度对符号学的单位是什么有过讨论。他专门进行思考的，不是命题而是“句子”，但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这使它们出离了语言和语言学的范畴。他也不大重视单词，一部分原因是某些词汇分解成了更小的有意义单位，语言学称之为词素（morphemes，譬如 cats 由词素 cat 和词素 s 构成，后者表示复数）。然而，由于某些限制条件，实际上，索绪尔把单词——被认为能够作为独立实体进入与其他这类实体之间的关系——当成了符号最为透明的范例。

然而，如果将单词和词素当做语词符号的首选范例，就会产生著名的指称性问题。譬如对“cat”这样的单词，我们能够指向那种浑身长毛、有四条腿、跑来跑去的动物，但“the”这样的单词该怎么办呢？“the”有几条腿？但是，如果命题是语言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主要所在，那么，把“猫坐在垫子上”（the cat sat on the mat）这个命题里的“the”换成“a”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样的问题就是很有见地的。被暗示出的“世界的图示”是极其不同的。这种不同涉及的并不是什么猫或垫子，而是对关于特定的猫和垫子的知识有所宣示。这里所影响到的，与其说是模仿层面，还不如说是符号活动层面。说话人用“the”来宣示，自己知道所提到的那猫和那垫子，而且专门地暗示出听话人对此也是知道的。而说话人用“a”，宣示则弱了很多：任何垫子上的任何一只猫都是可能的。对譬如万宝路广告上的骑手这样一种物理性图示而言，模式是颠倒的：图示很容易被看到，命题则不然。但我们重申，意义是存在于投射出来的世界之中的——在万宝路广告这个例子中，这个世界里的工作是浪漫的，贴近大自然的，同时由于闲暇和作为闲暇之自然能指的一支万宝路香烟，这个世界由此变得完美无缺。

维特根斯坦提出，须在命题与现实的“图示”或“模样”的彼此关系中看待意义，这一提法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对意义的分析，哪怕是在口头符码中，也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语言符码的范畴和使用到普通符号学。这当然使自足的语言分析不再可能，但是它对实际的阐释操作却有了深刻洞悉，人们今天对它们的理解亦如是。譬如索绪尔所知的著名符号破解行动，如商博良之解析埃及象形文字，罗林森之解析亚述楔形文字，都依赖于以确切了解特定文本所谈论的内容为基础。现代阅读（和误读）理论显示，“倒置”这一策略，从感官的先行期待到特定文本的意义，效力

实在强大无比。信息理论用不确定性来衡量文本中的“信息”，在解码器中解决它。不确定性是知识存在状态所具有的功能，它也被用于衡量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跨文化交际方向的学生都知道，由于不同的文化团体中的不同看法，误读的发生有多么频繁。无疑，这使得我们无比需要在这个方向拓展符号学研究，把对既定社会文化知识储备的描述和分析包括其中。然而，如果社会成员们在成年之前已经获得完成这一伟业的能力，那么，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策略便成为是符号学的分内之事。

只要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的总体联系由于问题太多而被规避，针对特定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联系策略所进行的研究也就会被耽搁或被忽视。但是，为了实践的目的，重要的是寻求辨析各种错漏和各种谎言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讲，是为了发展出更为狡猾的欺骗或掩盖真相的方法。索绪尔没有对这类问题进行思考。皮尔斯对此却有了一些考虑。皮尔斯从逻辑中提取出“模态(modality)”这一范畴，即一个命题所具有的那种真值。在他看来，模态类型有三种：实存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事实上真实、逻辑上必要和假设）。他把强度当做模态的一部分，这是语言学在50多年里所未曾认识到的。他关于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这种分类，把模态值内置其中了。象似符是图画一般的符号，它们要么就是它们所表示之物，要么很像它们所表示之物，具有可以直接体察的模态，因此是符号中最富说服力的（正如现代广告商和新闻编辑所了解的那样）。指示符是在因果链中（譬如，烟—火）或者毗邻关系中（譬如，胳膊—人）形成的。它们具有高度的模态性（即符号与意义之间密切契合），但由于它们仍然是基于一种判断或推导行为的，所以它们的模态性比像似符要低。规约符通过约定俗成的纽带（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类似）把符号和客体联系起来，具有最低的模态性，尽管皮尔斯在其革命性的方案中也把使用规约符的符号活动看做思维的最高形式。

皮尔斯对模态的处理相当粗陋。三种模态，三种符号，并不足以解释运用于该领域的整个系列策略，而且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符号学家们又常常滥用皮尔斯的术语。但是，至少皮尔斯把这个论题提上了符号学理论的研究日程。埃科正确地将符号学称为“关于撒谎的理论”（1976：7），就此而言，对根据对现实的规范性描述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对读者和信息进行定位，以求让谎言更为有效的这样一整套撒谎策略来说，符号学是断然不能忽视的。与此同时，符号学需要思考控制谎言及其效果的方法。

结构主义和符号的物质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索绪尔对符号学影响的论述似乎大部分都是否定的。现在是该对这种某种意义上的偏颇进行纠正的时候了。索绪尔对符号学有重要贡献，而且我们相信，后索绪尔时代的符号学仍然有须向索绪尔借鉴的地方。毫不奇怪，对于符号学的两个领域，索绪尔为之付出了毕生大部分心血，为之贡献最多，但现代的符号学家认为，对于索绪尔所做的，他们已经消化了并且超越了，或者说，他们可以稳妥地对之加以忽略。在本节中，我们将对索绪尔的价值概念展开思考，尤其是针对这一概念被运用于能指结构时的情形。之后我们会谈到历时性、历史和变化所起到的作用。

索绪尔的价值概念是结构主义的基础。对索绪尔来说，价值指的是一个元素在一个体系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价值是由相同和对立组成的综合体构成的。索绪尔阐述了价值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与指称物彼此对立的，他的方法是将法文单词 *mouton* 和两个英文单词“*mutton*”和“*sheep*”进行比较。这个法文单词所指称的，与这两个英文单词所指称的，是相同的那个现实域，但是它却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因为这两个英文单词是彼此对立的，而 *mouton* 这个法文单词则是不可分拆的。

索绪尔用对语义对立的指称来阐述“价值”的方式很有启发性，但是，当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然语言中的词汇体系，却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还没有哪个自然口头语言中的所指体系可以用索绪尔这些术语进行充分解释。结构主义之所以获得支持，在于它在分析音系符码这种人类语言的声音符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结构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是与特鲁别茨柯伊和雅各布森等人的著述密切相关的，这种成功使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写于1948年的著作中，把语言学转化成了一种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科学和模式。这类成果，即使是像此处一样属于非常狭窄的前沿，而且仅仅关注一种符码的表意体系，却被证明，对于理论发展而言，它是比任何其他概念更为实质性的基础，尽管其他概念也不乏启发性。索绪尔不仅为符号学事业提供了价值这一概念，而且其著作中清楚地对这种分析做出了前瞻，并在后来由特鲁别茨柯伊和雅各布森使之得到完善。

如我们在前边章节中看到的那样，索绪尔将物质性考虑排斥在外，在关系到符号分析方面更是如此，这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他的基本原则之一，而索绪尔所取得的成就，则要求他悖逆这种东西，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索绪尔把自己对声音符码的探索命名为“音系学（Phonology）”。卡勒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现代阐释者，对这个命名进行了研究。在卡勒看来，索绪尔混淆了音系学和语音学（phonetics）这两个现代语言学范畴，前者研究的是作为能指体系声音，后者研究的是音系体系的物质媒介，所以，卡勒声称，大部分被索绪尔称为音系学的东西都应被称为语音学。他还附加了评论：“在对声音的研究中，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把物理声音排斥出语言学体系之外的全部蕴义。”（1976：xxii）卡勒说得完全正确，索绪尔在这里的确同他惯常的反物质主义立场不一致。但是，这恰恰是因为索绪尔明确承认，声音体系的物质基础对于研究其结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才能取得自己的理论突破。

索绪尔对语音的分析以发音机制——发音器官的各个部分负责发出不同的声音——作为基础。既然“发音机制从不变化”（p. 33），那么，产生声音的物质基础便为描述所有语言中的声音提供了一种普适性基础，即使实际的声音体系多种多样而且不稳定。在传统音系学中，声音按照特征加以标识，而特征则来源于发音机制中最有特点地涉及产生了这些声音的那个部分。譬如唇齿音 d 或 t 是舌头触碰牙齿发出的，边音 b 和 p 则是用嘴唇发出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发音空间进行了细分，并被赋予了意义，而这些便成为对音流进行细分的基础。索绪尔把这种分析推到了更为抽象的层面。他提出了多种备选方案。在其中一个方案中，索绪尔规划了四种基本语音类型，它们产生于四个基本的发声行为：呼气、口头发声、用嗓和鼻腔共鸣。接着他再向前一步，提出要从一个单一原则中得出所有语音，即±闭口（或±开口）。发音机制的各个部分使开口或闭口的程度不同。不同的语言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点，产生出其自身音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声音来，但语音的多样乃是这单一原则的实现，要受到为之提供无数实现样式的物质的现实制约。索绪尔的分析最后结束于从开口到闭口这个连续体中的七种语音类型。处于一极的是元音特征最明显的那些元音（最大开口度），处于另一极的是辅音特征最明显的那些辅音（最大闭口度）。他把语音分为七种这一创造，模糊了他的提议所具有的极度简化特征，而极度简化正是结构主义对音系体系的普遍形式所进行的分析所具有

的本质特征，他所采用的方式同雅各布森广为人知的方式具有相似性，但是后者做出描述的时间要比他晚了一些。

索绪尔还分析了口语链中的音素，即音系层面的横组合结构。再一次地，他采用了以一条单一原则的方式来提供一种极其简约的分析。他观察到，语音在话语中结合的时候，涉及的要么是内爆破（闭口进行），要么是外爆破（开口进行）。音节组合的横组合规则于是可以用内爆破或外爆破动作来进行具体表述，正是二者建构出了音节的性状和分界。所以，这条抽象规则既负责音系符码中的纵聚合结构，又负责其中的横组合结构。索绪尔的提法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具有综合性，干净利落。他允许自己为这项成就感到一定的骄傲：“第一次，我们摆脱了抽象化。第一次，我们发现了具体而不可或缺的单位，它们在口语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乎节律。”（p. 53）有趣的是，对于自己突然下滑到实际口语链“具体而不可或缺的单位”，索绪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正如卡勒的批评所暗示的那样，索绪尔把他的成功看做是与物质主义策略不可分割的。

令人惊奇的是，索绪尔的分析成果被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大大地忽略了。他对横组合链的分析很少被提及。即使是对音系纵聚合所进行的结构主义分析，如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所发展起来的那种，虽然受到欣赏，却并没有被众多符号学家用作普通符号学方法的基础。两大例外是雅各布森自己，以及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但是，雅各布森的拓展超出了狭隘范畴，列维-斯特劳斯则倾向于在音系学模式的使用中进行思辨和反对体系化。这就为符号学中的结构主义传统留下了一个悖论：那些成果让它声名鹊起，但它却难以从中汲取经验。

这个发展姗姗来迟，作为起点，我们要以普通符号学形式来着手处理某些结构主义原则。在破解音系符码的过程中，索绪尔对其根本特点连贯性和简约性进行了阐述，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借助抽象的基本双分原则，把这个原则所产生的无数特定形式反复应用于符码的物质基础。对此的辩证运用，可以产生出无数的仍然具有意义的不同形式。不过，它们的意义是双分原则和物质基础二者共同造成的，因为二者彼此作用。形式的多样性不能化约为潜在的双分原则，双分原则自身也不可能始终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同一条双分原则，又会以抽象的或类似的形式，把符码的横组合结构和纵聚合结构都组织起来，所以在横组合及纵聚合之间会产生一种同系关系。音系符码的纵聚合结构不仅仅建立在从共通原则到横组合层面的原则

之上，它们还发源于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构成符码的那些特征是从单一的横组合中得来的：气体自肺部到体外，经过无数阻碍，利用沿途的各种机遇，才完成了言说之旅。在结构分析中，纵聚合与横组合、结构与操作、意义与事件、统一与多样，彼此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必须成为单一描述的互补方面。我们可以对这些源自索绪尔的物质主义结构主义原则做出总结：

1. 双分原则与编码媒介的物质性质之间相互作用，而符码的结构，正是通过少量双分原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建立的。符码的统一性来自总体性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关联关系，符码的多样性来自物质基础，这些原则作用于该物质基础之上。
2. 纵聚合结构特征的来源，看似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其实是由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和目的所构成的物质世界。
3. 符码之中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是由同样的一套原则构建起来的，两种结构通过同型关系被联系在一起。

032

历史、变化、转换

索绪尔通常被看做反对语言中历史性阐释的代表，实际上，他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存在于他所制造的断裂之中——索绪尔背靠比较语文学传统，但他却反对这个传统的历史指向。卡勒基本上就是这种看法：“简而言之，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涂尔干为了对规律的人际体系进行研究而抛弃历史和因果性的阐释，使得社会科学发生了变革”（1976：xiii）。这一论断代表了结构主义的现代正统观点，但是，如果说这代表了关于索绪尔的全部事实，那么就太让人难以置信了。索绪尔是比较语文学这一学科的杰出倡导者，而该学科的策略和任务根本上是历史性的。的确，索绪尔坚持认为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研究语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方法，而且为共时性语言学研究开创了比他所继承的传统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他却把历史、过程、流变看成了语言的常规条件。在《教程》中关于共时语言学的章节里，索绪尔确立了“语言状态”这个观念，但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近似的概念。实际上，他在注释中说，“绝对不变这类东西的确是没有的。”

(III, i, p. 140) 他抛弃了语言学规律必须既有普遍性又有强制性这种观念。“共时性虽然法则，”他说，“具有其规约性，却不具有命令性，而历时性法则具有命令性，却不具有规约性。”(I, iii, p. 6)。也就是说，共时性虽然是理性的，却不具有强制力。因此，索绪尔把历时性看做因果阐释的场域。这很难说是像卡勒声称的那样，抛弃了历史阐释。

话语是在时间之中展开的，索绪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坚持口头符号具有这种特征，并将其提高到他关于符号的第二原则这一位置。(实际上，他可能夸大了历时性在口头语言中的作用。语词发出的时候同时伴随着音高和音调，而且许多符码中都存在着共时性的横组合，对此我们后面会加以关注。)但是，针对幅度更大的文本，情况常常是，如果把跨时间的诸多要素考虑到一种重要关系之中，文本中就只有意义存在。我们可以对这个总结进行推广，把那些产生于不同时间的文本或者文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进来。如果我们在这里使用历时性这个总体术语，把无论或长或短的时间维度都包括进来的话(索绪尔并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悖论性的结论，即哪怕是在共时性“语言状态”中，历时性对意义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绝对不能认为索绪尔抛弃了时间或历史，尽管同样也很明显的是，索绪尔觉得它很成问题。

把上面这些观点归诸于索绪尔并非我们的目的，因为这只是后见之明。我们想说明的是，索绪尔与历时性语言学打了终生交道，这不可能不给他留下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具有深刻反讽意味的是，索绪尔为共时语言学所做的辩护，却被想当然地用于合法取消历时性的维度，这意味着索绪尔作为一名实践型符号学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都被轻易地忽略了。有理由假设，这位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会认为，他的听众认识到了历时性语言学的重要性，所以他才能如此无拘束地对之展开探索。现代符号学家认为，历时性是如此明显地无趣，以至于他们不想费神去严肃对待索绪尔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不打算就此问题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如果我们转回头去看看《教程》，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关于历时性现象的敏锐观察，这并不出乎我们所料，因为它们所欠缺的，仅仅是一个把它们讲明白的总体性框架。索绪尔进行了如此广泛的历时性现象的研究，全部讲的都是关于语言变化的例子，其中大部分与词语的语音相关。用更为现代的说法，我们可以将他所发展的理论称作转换理论(a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譬如他关于音系结构的理论，研究范围狭窄，需要进行拓展，

以便将其他符号体系囊括其中。由于索绪尔以忽视语言社会语境为一大特色，而语言社会语境正是历时性法则的“强制性”的源头，因此，他不能对自己描述得如此精细的转换操作做出阐释。但是，既然这项工作尚未完成，那么索绪尔的转换理论就仍然对研究有益，因为现代符号学缺乏的就是一种让人满意的转换理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随着乔姆斯基方案走向衰落，人们对转换的严肃兴趣也开始减弱。我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所提出的理论，算是这种趋势中一个形单影只的例外。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对于转换，描述数量有限，而且不乏偏颇的论说。弗洛伊德的确提出了关于转换的一个有力而全面的理论，但它不够体系化，而且未能被应用到符号学主流中去。

尽管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做了清晰的区分，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所有与转换有关的系列操作，都必须首先作为共时状态中的替代之物而存在。“在说话（言语）层面，总是先有事实，或者更应该说，先有大量相似的事实，之后才有事实衍变。”（p. 98）索绪尔拒绝对言语进行理论化，或者说，他不认为言语是理论的对象，这种姿态模糊了他在这里所说内容的重要性。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转换产生于共时状态，产生于语言使用的社会条件。在这个共时状态中，他说，作为变化的起点，至少有两种形式是必须共同存在的，哪怕二者差别细微。索绪尔没有对这种分别提供阐释，尽管从沃洛辛诺夫的理论中是肯定找得到一个阐释的。因为后者认为，作用于符号的分裂力量来自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索绪尔特地排除了两种共存形式之间的转换关系，这个决定使得他要成功对变化做出阐释变得难上加难。但是，他的确做出了一种有用的清晰化操作。他坚持认为，所有的变化必须按照极为严格的顺序进行罗列，一次只列出一个变化。譬如现代法文单词 *chaud*，意思是“温暖”，来自拉丁词语 *calidum*。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不出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二者却是遵循这样一个序列发展的：*calidum*—*calidu*—*caldu*—*cald*—*calt*—*tsalt*—*saut*—*sot*—*so*。他注意到，如果我们只看到开头和结尾，那么，在这种形式中，理性和可理解性是两两相对的：“单独地看，每个步骤都绝对确定、符合规则、效果有限，然而，整体地看，这个单词给人的印象则是细微变化无限多。”（p. 152）

在这类序列中，索绪尔注意到两类变化。他无助地称其中一类为“自发式”，称另一类为“组合式”。自发式变化，指纵聚合体系中声音价值的变化（譬如从 *c* 到 *ts*），所以我们称其为纵聚合转换（*paradigmatic trans-*

formation)。组合式变化涉及对存在着的组成部分的横组合排序（譬如 calidu—caldu），我们称其为横组合转换（syntagmatic transformation）。索绪尔还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范畴，他称之为“有条件限制的自发性”变化，指依赖于其语境中特定横组合条件的纵聚合转换（如某元素在单词中所处的位置）。所以，要理解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理解它的精确转换历程，而这一历程是由横组合与纵聚合转换二者所构成的，它们分别起作用，但配合默契。

对索绪尔的转换理论和乔姆斯基后来做出的更为有名的阐述（1957，1965，1976）进行比较是很有好处的。乔姆斯基把自己的理论实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共时状态的横组合转换上，他认为这是可逆的，是语言与典型说话人意识的一部分。索绪尔理论把纵聚合转换和横组合转换都包括在内，而且他对变化进行了不懈地追溯，直到抵达变化不再可逆的那个点。所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可谓索绪尔转换理论的特定子集。如果理性取决于共时性语言状态的正式成员的思想状态，那么，索绪尔把历时性看做延伸进了非理性领域这种看法就是正确的，历史便是特定社会中决定性的非理性之物。弗洛伊德也对难以逆转的转换进行了研究，在他那里，是将其作为无意识操作的特别产物。索绪尔的研究倾向使自己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但他比乔姆斯基走得更远，乔姆斯基明确地把一切类型的非理性通通地赶出了语言学领域。

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乔姆斯基的工作，在“深层结构”观念方面，在把这些操作定位于不可知的人类意识深处方面，暗示的是一种相反倾向，而所有被索绪尔按照顺序做出排列的形式，在之前则都有着先在的社会和物质。如果索绪尔被迫去重构一个假设的形式，那仅仅是因为那种形式在此之前被遗失了，只是被它所留下的空间或罅隙打上了印记而已。《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对转换理论中“深层结构”的作用和地位的描述是误导性的，过多地受到了乔姆斯基所做阐述的影响。现在，我们把成序列的物质性文本或文本形式确定为转换这个概念的阐释核心，而之前的文本或结构，并非“更加深刻”，只不过是“时间更早”罢了。但在许多符号活动事例中，这一序列经常是不在场的，必须靠符号制造者暗示，靠符号接受者重构。一定程度上，这些暗示出的或重构出的序列是文本属性所产生的效果，同时，它们也受到符号学参与者的目的和了解的强烈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称之为“深层”

结构的那种东西所包括的内容。这样的分析实践，我们认为似乎仍然站得住脚，但三维稳定性这种幻象——“深层”这种暗喻对文本或意义有所暗示，而文本或意义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它们的非实体性——则让现在的我们颇为不安。术语“符号活动所产生的投射”（semiotic projection）算不上十分误导。尽管和这个术语名称相比，符号分析中意义这个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说服力更值得关心。

索绪尔着重处理历时性变化，因而带出了其他问题，对之他也有过研究。完整的历时变化链总是超出属于特定社群的成員的知识范围。如果作为整体的历时链的中介必须存在于特定时空之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它们在人类的社会操作之中扎下根来呢？它们只有在元语言层面才能看到，只有学究才能触及。另一类索绪尔没有打算进行调查的历时性现象，即开端和结尾都模糊不清或暧昧难明的历时性横组合结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似乎都不得不启用跨历史的主体，或者一个位置上多个主体所组成的集合，然而这些不过是寻求着作者的无数意义结构所做出的投射。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的观察仍然行得通：“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却是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的。对它们的研究很困难，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确切地知道，说话人的意识是否与语法学家的分析走得一样远。但重要的是，分析到最后，抽象实体总是建立在具体实体基础之上的。”这里，我们再一次领略到索绪尔的风采，他能够对历时现象做出微妙而让人叹服的判断，因为他敏感地发现物质性的、具体的事实是阐释的基础，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索绪尔把历时性当做不可理解的流变抛在一边。

我们自身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所做的工作，是发展出一个有力的转换概念，它的力量来自于充分理由，而且适用于具体文本，但是它没有把这一点明显地同历史分析理论或策略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把发展关于历时性的综合理论看成我们投身其中的这种符号学事业最迫切的需要，只要其能够对诸如大大小小的变化、操作、危机、革命等等关键现象做出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相比其他结构主义形式，决定性的优点在于它一直都承认历史，对历史做出了理论性阐述。我们相信，任何忽略历时性维度的社会符号学，都不可能胜任其职。

根据索绪尔关于历时性和转换的工作以及我们对这个论域的反思，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项原则：

1. 所有符号学活动都发生在时间之中：所有符号现象都是历时性的，无论时间范围是多么小（产生或阐释某单一横组合段的时间，话语中横组合段语流的时间）或多么大，（大到）人类符号活动史也包含其间。
2. 每个横组合段都是转换操作的一个时间片段，在时间中朝后（朝向同一次交流中的前一个横组合段，朝向前一个话语或符号活动）或朝前（通过解码者和编码者，朝向后一个横组合段）运动。这种操作，有着其严格的时间秩序，是阐释该横组合段的关键。
3. 符号学领域中的每个结构和关系都受制于转换活动：因此有了横组合和纵聚合转换以及其他转换操作，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每个符号学对象。
4. 每个转换都是具体性的事件和中介、缘由等，都源于物质与社会生活：任何历时链的阐释基线，都是它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叠。
5. 转换能够具有力度和效度，即便其整个幅度是意识所无法触及的。因此，对转换的分析能够揭示意义的结构，意义结构的活动是无意识的，但在特定阐释语境中又是决定性的。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来描述本章中的符号学传统。我们把符号学传统阐释为动态的、非封闭的，而不是一套有待（全然或者逐步）接受或拒绝的一成不变学说。我们不是从索绪尔出发，也不会去决断索绪尔的思考在何处结束。我们从索绪尔的思考中看到了种种可能性，它们同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其他可能发展脉络彼此关联，但是，我们不会把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认识归功于索绪尔，也不会宣称对这些可能性的发现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没有转过头去追溯索绪尔（或皮尔斯、沃洛辛诺夫）“真正地”思考了什么，仿佛这成了某种已有定论之物，对之其他评论者已经看到了或者无缘无故地忽略了。我们对索绪尔的专门阅读是一种批评性阅读，对他在多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转换，所以我们不会认为假设索绪尔仍然在世的话，他会对我们所说的每件事情都表示赞同。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漫不经心地去读索绪尔以及其他奠基之父的著作。与此相反，精确地认识存在于索绪尔之中、存在于在任何历时链的必要起点的那些结构和裂隙之中，对于这种批评——转换工作的展开，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经粗略地描述了我们自己这种社会符号学理论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和前提。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些做成一套公理の様式，再用说明和支撑性论述来使之完备。但是，这种表现方式总会起到负面效果，使之思想僵化，把它变成无根之木，阻碍它的进一步发展，让它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可理喻。对传统的历时性的描述，使读者摆脱了传统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缺乏一致性的这种压迫感。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人们相当清楚地知道，它是必要的，它是不断争议中的里程碑，它是为了明晰而不懈的奋斗。

第三章 作为意义的语境：符号活动维度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沃洛辛诺夫将其针对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的批评聚焦在一个单一错误上，他称之为“伪核心”——把话语当做某种个体性的东西加以否定。针对这一错误，沃洛辛诺夫坚持采用与之针锋相对的提法：言说是一种社会现象。接着，他把言说——即单一性的符号行为——置于社会符号学的核心地位。之后，他做出了下面的阐述，这个阐述我们已经引用过，但还是值得在这里重复：“符号形式首先要受到相关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的制约。”

这种关注焦点的变化标志着与结构主义符号的根本决裂。在过去约二十年里，大量理论家开始向这个方向推进，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行为语境的方方面面，但他们都注意到了符号语境的重要性。

我们将以交通灯为例来阐明这种新方向所包含的某些蕴义。结构主义者很喜欢这个例子，因为交通灯似乎是经典的简易性的符码。按照惯例性符码，有三个能指（红、绿、褐黄/黄）与三个所指（停、行、慎停/慎行）彼此相关联。由于按照惯例红灯在顶部，绿灯在底端，黄褐色灯在中间，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符码，但这似乎无关大碍，因为它只是重复其他符码而已。那么，对于如此基本的体系，我们有什么更多的可说呢？

答案是：如果我们坚持忽略语境的话，的确没什么可说。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体系如何在自身语境中运作，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明白，

语境是其意义的核心部分。我们还能明白的是，由文本（成序列的交通信号）与其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意义，是复杂的、影响深远的，在终极意义上是属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交通信号，当然（这似乎明显到不值一提），被安置在路边和交叉路口。这不仅仅是它们的使用语境，还包括了对于其意义至关重要的信息。它们主要向驾驶员宣示信息，而且驾驶员与其所驾驶的机动车也包括在其意义之中。譬如红色并不仅仅代表“停”。它的意思是“驾驶员，停”。在语境中，它携带着其他意义，这些其他意义正是其模仿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承诺，位于交叉路口其他位置的驾驶员的行为是可以预计的。其他驾驶者本身，也会停或行，如他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于是，它具有一种模仿内容，暗示着物理世界中的事态。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它可能被“某个闯红灯的疯子”破坏，让“它具有力量”这种说法成为谎言。

的确，为了能在特定地点安全驾驶，我们须理解，这类文本是由不同阶层、性别或其他文化方言所建构的。在悉尼，对于特定驾驶员群体而言，黄灯的意义是“如果接近交通灯了就提速”。在这个群体的方言中，红色自身至少有两个能指：“刚刚变红”和“变红了几秒钟”。在上述方言中，“刚刚变红”意味着“继续向前开，通过交叉路口”。所以，“绿灯”在该方言中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是，同样变得显而易见的是，驾驶者必须是“会多门语言的”，必须注意到不同方言的存在，并理解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因此，对于所有使用这一符码的人来说，“绿灯”变成了“在认准是否有使用这种其他方言的人在场之后再继续向前开”这一意义的能指。社会因素的复杂性促生了次级方言的出现，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其实不难，这些因素包括：交通状况、上下班时间、对权威的态度、性别态度、种族差异，诸如此类。

于是，作为文本，交通信号建构出一种特定的语境，它既是物理语境，又是一种参与者组织。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信息必须被理解，必须在一般存在内置性冗余这一基础上来理解——几盏交通灯所言说的是同样的内容，却增加了许多其他的附着性符号。即使是顶端加上红灯、底端加上绿灯，这种复制信息从功能上说仍然是冗余的，因此，即使这个序列中某个颜色不亮，譬如在功能失控情况下，文本仍然是能够得到解读的。但这并非它所传递意义的界限。这些符号的社会意义，部分是因为在它们的操作中人类这个中介者的缺场。在两个意义上，发布这些指令